

# 地理标志认证驱动区域农业绿色发展的逻辑与实践

王 健, 蒋 昊, 刘奕彤

大连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辽宁 大连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24日

## 摘 要

生态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作为兼具法律确权与品牌赋能功能的制度工具, 正日益成为推动区域农业绿色转型的重要作用。本文立足于地理标志认证与农业绿色发展之间的理论关联, 系统分析了地理标志认证对区域农业绿色发展的多维驱动效应。研究表明, 地理标志认证主要通过四个机制发挥作用, 品牌溢价机制通过市场价格信号倒逼生产端采用绿色生产方式; 产业集聚机制促进上下游企业合作和本地农业价值链纵向整合, 降低绿色技术的推广成本; 标准化生产机制以严格的品质标准体系约束投入品使用, 推动生产全过程的绿色转型; 生态反馈机制则通过保护地理标志赖以存在的自然生态环境, 激励资源节约和生态保育行为。

## 关键词

地理标志认证, 生态农产品, 农业绿色发展, 区域农业

# The Logic and Practice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Certification Driving Regional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Jian Wang, Hao Jiang, Yitong Li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alian Ocean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Received: May 15, 2026; accepted: June 16, 2026; published: June 24, 2026

## Abstract

As an institutional tool that combines legal confirmation and brand empowerment functions,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GI) certification for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agricultur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I certification and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multidimensional driving effects of GI certification on regional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GI certification primarily functions through four mechanisms: the brand premium mechanism, which forces producers to adopt green production methods through market price signals;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mechanism, which promotes collocation of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enterprises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local agricultural value chains, thereby reducing the promotion cost of green technologies; the standardized production mechanism, which constrains the use of inputs with a strict quality standard system, promoting green transformation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the ecological feedback mechanism, which incentivizes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by protecting the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n which GI relies.**

## Keywords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Certification,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Regional Agricultur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农业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球农业转型的共同方向。然而，要实现从概念倡导到实践落地的跨越，首先需要对其内涵进行明确的操作化界定。本文所指的“农业绿色发展”，是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导向，实现化学投入品的减量化使用、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控制、土壤与生物多样性的系统保护，并同步提升农产品品质与生态服务功能的发展模式。具体而言，其操作化指标包括：单位面积化肥农药施用强度下降、有机肥替代比例提高、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上升、产地环境质量达标率提升，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稳定在较高水平。这一界定为后文评估地理标志认证的绿色驱动效应提供了可观测的基准。

在众多制度工具中，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正日益显现出其在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方面的独特价值。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特定地域，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域的自然因素或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识。作为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sup>1</sup>所确认的知识产权形式之一，地理标志兼具财产权属和公共品牌的双重属性，既保护特定地域内农产品的特有品质，又赋予该地域内生产者以集体的品牌使用权。然而，地理标志认证与通常所说的绿色食品认证、有机产品认证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厘清这一关系是避免概念混用的前提。绿色食品认证侧重于“安全优质”，强调在生产过程中限量使用化学合成物质；有机产品认证则禁止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等，追求全过程的自然生态。相比之下，地理标志认证的核心逻辑是“原产地关联”——产品的特定品质源自地域自然或人文因素，而非强制规定投入品的种类或用量。换言之，地理标志认证本身并不必然等同于绿色或有机生产，一个地理标志产品完全可能在法律上合规但采用高投入、高产出的常规生产方式。

然而，正是这种“非强制性”特征，反而揭示了地理标志认证驱动绿色生产的独特路径：它不是通

<sup>1</sup><https://ipr.mofcom.gov.cn/zhuantilaw/conventions/wto/trips.html>

过外部禁令直接约束生产者,而是通过市场机制和制度设计的内生激励,引导生产者自愿走向绿色转型。具体而言,地理标志认证通过四条路径将绿色生产内化为生产者的理性选择。第一,品牌溢价路径:地理标志产品因地域特色品质获得市场高价,而该品质高度依赖良好的生态环境,从而倒逼生产者减少化学投入品使用以维持品质稳定性。第二,标准化生产路径:地理标志认证通常配套有生产技术规程,这些规程虽未必达到有机标准,但往往对农药、化肥的使用种类和上限作出明确限定,形成事实上的绿色规制。第三,产业集聚路径:认证促进了同类生产主体在特定区域的空间集中,降低了绿色技术的推广成本和信息溢出门槛。第四,生态反馈路径:生产者逐渐认识到生态资本是产品品质的根基,从而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保育”,形成生态改善与品牌增值的正向循环。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路径的有效运行并非没有内在矛盾。本文后续分析将揭示一个显著的逻辑张力:地理标志认证强调标准化生产,但实践中认证后的动态监管却往往薄弱——“有标准、弱执行”的矛盾普遍存在。这一矛盾的根源在于,地理标志认证体系的重心长期置于“入口管理”,而“出口监管”相对滞后。然而,这并非不可调和的静态缺陷,而是一个动态演进的制度张力。随着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的推进,以及大数据溯源、卫星遥感等数字技术的嵌入,监管能力正在逐步追赶标准化要求。正是这种“标准先行、监管跟进”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构成了地理标志认证持续驱动农业绿色转型的真实动力。换言之,标准化与弱监管之间的矛盾并非逻辑错误,而是制度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反映;其解决程度恰恰决定了地理标志认证绿色驱动效应的强弱。

近年来,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的数量快速增长,地理标志认证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地理标志认证在实现“优质优价”的同时,是否同步促进了生产方式的生态化、资源利用的集约化和产业组织的绿色化?换言之,其绿色驱动效应是自发的还是条件性的?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关系到对地理标志制度功能的理论认知,也关系到如何在实践中更好地发挥其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引领作用。

## 2. 地理标志认证驱动农业绿色发展的内在逻辑

### 2.1. 品牌溢价机制, 市场价格信号对绿色生产的逆向传导

地理标志认证最直接的经济效应是品牌溢价[1]。研究表明,地理标志农产品通过品牌溢价实现了显著的市场价格提升,从而将“好品质”转化为“好价格”。

这一溢价效应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将绿色生产方式的经济效益内生化的。当消费者愿意为带有地理标志的产品支付更高价格时,生产者便获得了采用绿色生产方式的直接经济激励[2]。原因在于,地理标志认证所确认的产品“特定品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原产地的生态条件和环境质量。如果生产者为了追求短期产量而采用高强度化学投入品,导致土壤退化、水体污染或生物多样性下降,那么产品所依赖的“地域特色品质”就会随之衰减甚至丧失,地理标志的品牌价值也将受到侵蚀。因此,品牌溢价机制的作用不仅在于“卖得更贵”,更在于建立了一种持续的正向激励——谁保护生态环境,谁就能持续获得市场回报。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机制的有效性依赖于两个前提条件,其一,地理标志产品的市场溢价足以覆盖绿色生产带来的额外成本;其二,地理标志的品牌保护体系能够有效防止“搭便车”行为——即非绿色生产者冒用地理标志以获取不当收益。如果这两个条件不满足,品牌溢价对绿色生产的激励就会大打折扣。这也是为什么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建设日益受到重视的原因——从“地标”到“地标示范区”,意味着更高水平的保护和管理[3]。

### 2.2. 产业集聚机制, 生态技术扩散的空间载体

地理标志认证不仅影响产品价格,还深刻重塑了区域农业的产业空间格局。从产业组织角度看,地

地理标志认证显著促进了县域层面的农业产业集聚。最新研究显示,地理标志认证通过强化投入—产出关联,促进了县域内上游农业生产者与下游涉农加工企业的共址,使得本地农业价值链纵向协调更加紧密。这种集聚效应不限于地理标志获证企业本身,还通过产业关联带动周边的配套企业和农户共同发展[4]。

产业集聚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集聚降低了绿色技术推广的规模门槛。在分散的小农生产格局下,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有机肥替代等生态化技术面临较高的单位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在产业集聚区,以龙头企业为枢纽的技术外溢和经验共享机制得以形成,绿色技术的推广成本被摊薄。其次,集聚促进了产业共生的形成。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需要一定的处理规模和产业链配套,产业集聚为这类循环经济模式的实现提供了有利条件。再次,集聚加强了环境规制的约束力。当一定区域内的生产主体高度集中且彼此关联时,环境监管的覆盖效率和执行力度都显著提升,偷排偷放、违规用药等行为的监督成本和博弈空间相应减小[5]。

从已有研究来看,地理标志认证对周边地区还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不仅影响获证地区本身,还通过经验、技术外溢及人员流动带动周边地区的农民增收和产业发展。这意味着,地理标志认证所引发的产业集聚及其绿色转型效应,具有跨行政边界的辐射能力。

### 2.3. 标准化生产机制, 绿色生产规制的制度化嵌入

地理标志认证的第三个驱动机制是标准化生产。地理标志认证要求农产品产地环境、产品质量符合国家强制性技术规范要求[6],产品称谓由地域名称和农产品通用名称构成,突出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因素。这一要求在实践中转化为一套涵盖投入品管理、生产过程控制、产品质量检测、追溯体系建设的标准体系[7]。

从制度设计层面看,标准化生产机制至少通过三条路径影响农业绿色发展。其一,标准体系直接约束了生产投入品的种类和用量。许多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技术规程明确规定了化肥、农药的使用上限和禁用品种,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化学投入品的减量。其二,标准体系建立了质量安全的全过程追溯能力。以福鼎白茶为例,当地通过卫星遥感和无人机测绘建立了数字茶园档案,构建了大数据溯源平台,实现了“从茶园到茶杯”的全过程信息追溯[8]。这种追溯能力不仅是对消费者的质量承诺,同时也是对生产者行为的有力约束——任何违规生产行为都将被记录在案,难以逃脱监管。其三,标准体系的推广和普及提升了区域内农户的整体生产规范水平。在广西,农业农村部门通过组织绿色食品集中会审、举办检查员与监管员培训、开展实地技术指导等方式,年均培训约2千人,有效提升了生产经营主体的专业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标准化生产机制对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并非自动实现。如果标准本身与当地的生产实际脱节,或者用标主体的实际执行率不高,标准化的规制效应就会大打折扣。

### 2.4. 生态反馈机制, 环境保护对产品品质的结构性支撑

地理标志认证驱动农业绿色发展的第四个机制,可以称为“生态反馈机制”。这一机制的核心逻辑在于,地理标志产品的“地域特定品质”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存在正向因果关系,因此对产品品质的追求内在地转化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9]。

具体而言,生态反馈机制包含三个递进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保护性生产行为。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者认识到,使用过量化肥和农药会破坏土壤微生物群落、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减少传粉昆虫数量,进而削弱产品的独特风味和品质特征。因此,理性的生产者会自发采用减量化、生态化的生产技术,以维护产品品质的可持续性。第二个层次是主动性的生态修复与保育。在安溪铁观音的实践中,推广生态茶园建设不仅意味着减少化学投入品的使用,还包括种植防护林、恢复原生植被、建立水土保持体系等积极的生态修复措施。这种从“少破坏”到“主动修复”的转变,是生态反馈机制深度发展的重要标志。第

三个层次是品牌价值与生态资本的循环强化。当良好的生态环境塑造了高品质的地理标志产品，而后者又通过市场溢价为生态保育提供经济资源时，二者之间就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正向循环——生态越好，产品越好；产品越好，价值越高；价值越高，越有能力投入生态保育。

正是基于这一机制，一些地理标志产品丰富的地区实现了从“被动保护”到“主动建设”的转型。广西地理标志产品以 952.1 亿元的总品牌价值连续三年位居全国第二，内蒙古绿色优质农畜产品年销售额突破 6000 亿元，这些经济成就的背后，都离不开对原产地生态环境的持续投入和保护。

### 3. 地理标志认证驱动的关键制约因素

#### 3.1. 认证体系有待完善

尽管地理标志认证已形成一定规模，但认证体系本身仍存在诸多有待完善之处。首先，地理标志认证与有机农产品认证、绿色食品认证之间存在交叉重复。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地理标志突出的是“地域特色品质”，有机认证突出的是“禁用化学投入品”，绿色认证突出的是“安全优质”。但在实际操作中，多项认证叠加不仅增加了农户和企业的认证成本，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规制冗余和资源浪费。据测算，仅广西一地，“十四五”期间累计落实的绿色有机认证补贴资金已达 3780 万元。这说明认证制度的经济成本不容忽视。

其次，认证后的动态监管体系尚不健全。地理标志认证是一个“入口管理”较强的制度安排，但“获证之后怎么办”往往是薄弱环节。一些地区的用标企业数量虽持续增长，但获证企业是否持续按照绿色标准生产、是否有偷工减料或违规用药等行为，缺乏有效的常态化监测手段。即便有追溯体系，其覆盖的深度和广度也有待提高。

再次，地理标志保护范围与实际的生态环境承载力之间存在张力。地理标志认证划定了一定的产地区域，但这一区域的自然环境承载力是有限的。当品牌价值持续攀升、市场不断扩大时，产地往往面临扩大产量与保护生态之间的两难选择。如何在品牌扩张的同时守住生态底线，是地理标志认证持续发挥绿色驱动效应必须面对的挑战。

#### 3.2. 用标主体参与不足

地理标志认证并非自动覆盖区域内所有生产主体。实践中，大型龙头企业通常是用标的主力军，而广大的中小农户往往游离于认证体系之外。这种“用标鸿沟”制约了地理标志认证对区域农业整体的绿色转型效应。安溪铁观音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企业从 2021 年的 162 家增至 2024 年的 324 家，增长 100%，但相较于当地庞大的茶农群体而言，用标覆盖面仍有提升空间。

用标主体参与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成本角度看，申请地理标志认证以及后续的标准化生产改造需要一定的经济投入，这对小农户构成了实质性门槛。从信息角度看，部分中小生产者对地理标志认证的内涵、价值和申请流程缺乏足够了解，存在“不知道如何申请”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激励角度看，如果市场溢价的收益不能有效传导至基层生产者，那么大范围推广绿色生产方式的动力就会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问题涉及经济利益在产业链各环节的分配结构。地理标志品牌溢价的收益如何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之间合理分配，直接影响到认证体系对基层生产行为的引导能力。若农户仅仅是地理标志产品的初级原料提供者，而未能分享品牌溢价的红利，那么他们也就缺乏采用绿色生产方式的充分激励。

#### 3.3. 区域资源禀赋差异较大

地理标志认证对农业绿色发展的驱动效应，因区域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从整体格局看，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省际差距明显。这意味着，东部地区凭借较为发达的市场体系、完善的产业配套和较强的创新能力，在将地理标志认证转化为绿色发展动力方面具有先发优势；而西部地区虽然拥有独特的地理标志资源，但在品牌运营、产业链延伸、市场对接等方面面临更多困难[10]。

进一步地，地理标志认证的绿色驱动效应还与区域的产业基础密切相关。对于已经形成一定产业集聚规模的地区，地理标志认证可以更有效地发挥品牌溢价和产业协同效应；而对于产业基础薄弱、产业链条短、组织化程度低的地区，地理标志认证本身难以自动生发绿色转型的动力。实证研究也发现，地理标志农产品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存在异质性，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是重要的调节变量[11]。

此外，不同地理标志产品的“生态绑定程度”也存在差异。有些产品的品质特征与自然生态环境高度耦合——例如依赖于特定水质的农产品、依靠传统生物多样性的特色作物——其生产者维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更强；而另一些产品的品质特征可能更多地依赖传统加工工艺或人文因素，其生态环境依赖性相对较低，因此地理标志认证对其生产行为的绿色约束也相对较弱。这种差异提醒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地理标志认证就必然导向绿色发展，必须结合具体产品的环境关联性进行审慎分析。

#### 4. 结论与展望

生态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对区域农业绿色发展的驱动效应，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得到了日益清晰的呈现。本文的分析表明，地理标志认证通过品牌溢价、产业集聚、标准化生产和生态反馈四个机制，对区域农业的绿色转型产生了多维度的积极影响。安溪铁观音、五常大米、内蒙古“蒙”字标等典型案例的实践经验，进一步验证了这些机制的现实有效性和区域适应性。

然而，地理标志认证的绿色驱动效应并非自动发生，而是高度依赖于认证体系的完善程度、用标主体的参与广度、区域资源禀赋的适配性以及市场机制的健全程度。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地理标志认证就有可能沦为单纯的“标签游戏”，而难以真正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生态化变革。因此，未来在地理标志认证的实践中，应当更加注重配套制度的设计和实施，包括，完善认证标准与生产实际的适配性，降低中小农户参与认证的信息和成本门槛，加强获证后的动态监管和追溯能力，以及优化品牌价值的分配机制使生产端能够充分分享市场溢价。

从更广阔的学术视野来看，地理标志认证与农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制度耦合关系，为理解和解决农业生态转型中的激励机制问题提供了一个值得深入的研究进路。地理标志认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农产品市场价值的实现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内在地绑定在一起——不是作为外部的政策约束，而是作为制度设计的内生逻辑。这一点对于探索“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实现生态保护、如何在生态保护中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命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缺乏一手调查数据和大规模的计量实证分析，对于不同机制各自贡献度的量化评估尚未充分开展。此外，本文主要聚焦于地理标志认证对农业绿色发展的正向效应，对其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例如品牌溢价导致产地过度开发、生态资源被过度消耗等潜在风险——着墨有限。这些议题有待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 参考文献

- [1] 杨福霞, 甘伟铭, 宋子豪. 丘陵山区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经济与生态效应: 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J]. 地理研究, 2026, 45(2): 532-546.
- [2] 明哲, 杨斌. 县域农产品地理标志对农业产业韧性的影响研究[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5, 46(5): 930-941.
- [3] 孙丽凤. 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建设策略分析[J]. 商场现代化, 2025(6): 19-21.

- 
- [4] 艾玮炜, 张瑜, 杨继军. 农产品地理标志能否缩小县域城乡收入差距[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25(2): 32-42.
- [5] 蒋玉, 蒲雁斌, 丁玉莲, 金少胜, 于海龙. 农产品地理标志与企业品牌的溢价及其协同效应——以绿茶茶叶产品为例[J]. 经济地理, 2023, 43(9): 179-186.
- [6] 林昆祺. 福建省农产品地理标志发展现状及培育建议[J]. 乡村论丛, 2023(2): 98-106.
- [7] 陶慧玲. 云南省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现状分析与发展对策[J]. 安徽农业科学, 2021, 49(22): 235-238.
- [8] 广西农产品地理标志优势产业走出国门[J]. 农家之友, 2021(11): 14.
- [9] 杨萍, 邱强. 华东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区域差异分析[J/OL].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1-15. <https://link.cnki.net/urlid/11.3513.S.20260513.0956.006>, 2026-06-05.
- [10] 廖晓斌. 新疆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J]. 现代农业科技, 2026(4): 10-15.
- [11] 白东辉, 张琦. 黑龙江省数字经济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及区域差异分析[J]. 东北农业科学, 2026, 51(1): 102-108.